



世纪前沿

Trust and Rule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Charles Tilly

胡位钧 译

信任与统治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信任与统治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胡位钧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任与统治 / (美) 蒂利著; 胡位钧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 世纪前沿)
ISBN 978-7-208-09201-3
I. ①信… II. ①蒂… ②胡… III. ①民主-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4958 号

责任编辑 王舒娟
特约编辑 张笑天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信任与统治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胡位钧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5.75
插 页 4
字 数 207,000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201-3/D·1709
定 价 30.00 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前 言

这事儿得怪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西德尼·塔罗(Sid* Tarrow)。那是1995年,在出人意料的阿姆斯特丹聚会的前夕:道格、西德尼、罗恩·阿米扎德(Ron Aminzade)秘密策划并惟妙惟肖地上演了一幕滑稽戏——他们装扮成无套裤汉的模样唱起了“rap”,以此对我的作品进行了生动的演绎。在阿姆斯特丹聚会前的两年里,麦克亚当和塔罗一直在抱怨社会运动的研究与其他门类的大众政治(popular politics)研究之间缺乏联系。譬如,在他们看来,我对革命、国家转型、斗争剧目(contentious repertoires)和大众动员所作的研究,就未能与社会运动的一般分析(current analyses)很好地衔接起来。

在阿姆斯特丹的聚会上,麦克亚当、塔罗和我达成了和解:我们一致同意共同致力于新的斗争政治的研究路径,特别是要提出某种主张以使动员和斗争的各类研究得以兼容并蓄。经鲍勃·斯科特(Bob Scott)提议,并得到了哈丽雅特·朱克曼(Harriet Zuckerman)的支持,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同意资助“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开办极具包容性的3年期“索耶研讨会”(Sawyer Seminar),开展工作坊、研究会(fellowships)和学术访

* “Sid”是Sidney的昵称。为了方便中文阅读,Sid和Sidney均译为“西德尼”。——译者注

问。这个学术团体最终吸纳了 15 名研究生、7 名教师和数量日益庞大的临时参与者。^[1]

西德尼、道格和我一同在“中心”奋战了一年，我们撰写了若干纲领性的论文，其中一篇以《民主、非民主与斗争》(“Democracy, Undemocracy, and Contention”)为题，提交给了美国社会学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1997 年的年会。幸好这篇论文没有公开发表，并被人们及时地忘却了：它是我们三个人——在社会运动的形成、社会运动与不同类型的政权(尤其是民主和非民主的政权)的关系、民主化进程中社会运动的转型以及如何形成斗争政治的一般理论等问题上——三种截然不同的思路的简单叠加。7 年后重读这篇论文，预示着要走的路还很长。

其中一条路是我们必须穿越的：即在“斗争政治的形式”和“政权体系的性质”的相互作用问题上形成更加清晰的认识。在西德尼、道格和我的三重唱中，我们不断调整各自的分工，但总体上我更多地承担了政权和民主化问题的研究。不过，在我们的主要合作成果《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中，所有有关政权的论述都未被收录其中，由此可见我对他俩的影响着实微乎其微。不过，《斗争的动力》收录了有关瑞士和墨西哥民主化的比较研究，该研究阐明了民主化的两个步骤：一是公共政治与国民类别的不平等(categorical inequality)相隔绝，二是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相融合。

我回顾了其他学者有关信任的论述，其所反复呈现的两种取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表明相关研究——至少对于解释民主化和去民主化——是不充分的。这两种取向是：第一，几乎所有人都将信任描绘

为一种态度、一种个人倾向，即若要巩固民主便要设法使之包含对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信任；第二，大多数分析者都认为随着民主的敌人日益萎缩，这种态度的范围也正由窄变宽。上述两种取向相互搀杂，共同构建了如下假设——民主化的发展取决于能否形成一个具有广泛信任关系的公共空间。

在我看来，这些学者确实说明了一些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对内含于信任的社会过程作出准确定位。我认为：

- 信任是人际关系中的一项资产，人们就此彼此承担着失败和背叛的风险；
- 同一个人可以同时与其他不同的人保持不同的关系，从深深猜忌到深信不疑；
- 与其他公民、政治领导人或政府官员的关系亦复如是；
- 因此，对民主化和去民主化所作的任何解释都必须详细阐明：相对信任的关系是如何扩大到公共政治领域的。

大量长期而有风险的集体行为——如生育、同居、抚养子女、农业生产合作、长途旅行、维护礼制(ritual solidarities)等——与民主政权无关，但是这些行为显然包含着广泛的信任关系。因此，在我看来，信任之神秘处在于：非政治化的信任关系网络是如何使自身政治化的，是如何与政治网络建立联系的，或是如何被政治关系网络取代的。

鉴于其他地方的其他人也思索过同样的问题，因此，我广泛阅读，向朋友们讨教，通过电子邮件组发出一系列调查，并借助电子邮件进行

了广泛而充满活力的讨论。^[2]答案是肯定的：我身边的许多人都认为信任关系既重要又令人迷惑，大多数人都将信任视为一种态度而非一种关系，并将信任的起因和功效归结为争取承认。没有人一以贯之地对信任网络的变迁、对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关系变化作出解释，不过，范围广泛而门类繁多的历史研究与这些问题直接有涉。

我的研究愈是深入，上述问题就愈显紧迫。不久前我完成了《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 (*Contention and Democracy in Europe, 1650—2000*)，这部著作重点阐释了信任网络和民主化问题，对我在《斗争的动力》一书中的观点进行了提炼、修正和扩展。当《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日趋成形之时，我日益意识到在信任网络与公共政治的关系的变迁问题上，已有的解释和论证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考虑到叠加新的解释或增加新的论证可能使一部原本就不轻松的书更显笨拙，因此，我勉强搁置此事以待时日。如今，这一天到来了。眼下的这部著作就是其结果，并由您——我的读者——判断是否实现了预期。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有四位直接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他们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对手稿提出意见：阿莱娜·莱丁内瓦(*Alena Ledeneva*)帮助我对有关俄罗斯人际网络与信任的观点和素材进行了整理；玛格丽特·利瓦伊(*Margaret Levi*)既是信任问题专家，又是“剑桥比较政治研究丛书”**的主编，她以双重身份帮助我对一个又一个含混之处进行了澄清；雷纳尔多·奥尔特加(*Reynaldo Ortega*)放下手头有关西班牙和墨西哥民主化的调研工作，对我在上述两国民主化的论述中出

* 该书中译本已于2008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 《信任与统治》(英文版)是“剑桥比较政治研究丛书”(Cambridg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出版的第81部著作。——译者注

现的重要经验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审核和修正；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帮助我平衡观点，使我所擅长的政治过程研究和她所擅长的经济过程研究得以兼容并蓄。此外，珍妮弗·凯里(Jennifer Carey)细致入微地梳理了整部书稿；拉塞尔·塞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的听众(当时PPT出了故障，多亏西德尼·塔罗冒充主持人开了一阵子玩笑)和密歇根大学的听众，让我明白了哪些观点是可理解和可靠的，哪些观点有待改进。

经授权，我从拙文《变化政治中的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ties in Changing Politics”, *Social Research* 70, 2003, 1301—1315)、《信任与统治》(“Trust and Rule”, *Theory and Society* 33, 2004, 1—30)和拙著《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中援引了若干资料，特此说明。

注释：

[1] 实际上，这个项目最终延续了5年。除了感谢道格和西德尼之外，我还要感谢罗恩·阿米扎德(Ron Aminzade)、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伊丽莎白·佩里(Elizabeth Perry)、小威廉·斯韦尔(William H. Swell, Jr.)，感谢他们必不可少的协作。有关该项目之详情，请参阅麦克亚当、塔罗和我合著的《斗争的动力》(*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的前言部分，以及杰克·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主编的《国家、政党和社会运动》(*States,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的序言部分。

[2] 感谢大家对于问题的解答和在线讨论，感谢罗恩·阿米扎德、萨姆·鲍尔斯(Sam Bowles)、杰夫·布罗德本特(Jeff Broadbent)、胡安·科尔(Juan Cole)、乔纳森·福克斯(Jonathan Fox)、杰克·戈德斯通、汤姆斯·海尔克(Thomas Heilke)、米米·凯克(Mimi Keck)、戴维·莱文(David Levine)、斯科特·麦克纳尔(Scott McNall)、杰里·玛维尔(Jerry Marwell)、彼得·穆尔曼(Peter Murmann)、约翰·帕吉特(John Padgett)、埃莉奥诺拉·帕索替(Elonora Pasotti)、玛丽察·波罗斯(Maritsa Poros)、埃里克·塞尔宾(Eric Selbin)、杰斯珀·西格森(Jesper Sigurdsson)、马克·斯坦伯格(Marc Steinberg)、路易丝·蒂利(Louise Tilly)、弗洛伦西亚·托舍(Florencia Torche)、凯瑟琳·维德里(Katherine Verdery)、巴里·韦尔曼(Barry Wellman)、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埃莉斯·沃特沙夫特(Elise Wirtschafter)、王国斌(Bin Wong)以及一位草草落款“贾马尔”(Jamal)的网友。

目录

前言 / 1

第一章 信任与不信任之关联 / 1

第二章 信任网络如何和为何运作 / 35

第三章 信任网络的转型 / 60

第四章 信任网络对掠夺者的抵抗 / 94

第五章 从隔绝到整合 / 119

第六章 信任与民主化 / 149

第七章 未来的信任网络 / 182

参考文献 / 196

第一章

信任与不信任之关联

在 1367—1393 年间，圣芳济会(Franciscan)修士弗朗索瓦·博雷尔(François Borrel)——时任多菲内省* 上阿尔卑斯(high Alpine)昂布兰(Embrun)主教教区的宗教裁判官——对其辖区内的瓦勒度派教徒** 进行了严厉打击。在天主教会看来，这些堪称异端的原始基督徒们罪该万死：他们拒绝立誓、反对死刑、否认炼狱、抵制教皇的权威——包括否认教皇有追封圣徒的权利，甚至宣称由未脱原罪的神父主持的圣礼压根儿无效。仅就小范围而言，上多菲内省瓦鲁伊斯山谷(Valley of Vallouise)保存完整的 1379—1386 年档案表明，该教区 3 年内至少将 300 名瓦勒度派教徒送进了宗教裁判所。这些异端分子一旦被教会捕获，便被投入宗教裁判所严刑审讯，并照例被判有罪。

随后，教会将这些被判有罪的异端分子移送世俗当局，由后者将其烧死或绞死，并没收他们的财产。尽管部分瓦勒度派教徒从瓦鲁伊斯越过边境逃到了皮埃蒙特***，但也是尽失其所有。在宗教裁判所大行其道的 3 年里，仅瓦鲁伊斯一地没收的财产就高达 5 000 弗罗林——相当于风调雨顺的 1343 年整个多菲内省 40% 的王室税(Paravy 1993:II, 965)。

* 多菲内省(Dauphiné)：法国旧地名，相当于现在的伊泽尔省(Isère)、德龙省(Drôme)和上阿尔卑斯省(Hautes-Alpes)。——译者注

** 瓦勒度派(Waldensians)：亦译为“韦尔多派”或“瓦灯派”，是 12 世纪后期兴起于法国南部的一个基督教教派，被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廷视为异端，现被公认为宗教改革的先声。——译者注

*** 皮埃蒙特(Piedmont)：现为意大利西北部大区，与法国、瑞士相邻，首府都灵。——译者注

实际上,在宗教改革发端之前,瓦勒度派教徒从未自称是瓦勒度派,这个称号拜其敌人所赐;不过,他们自己所用的称号也不尽相同:兄弟会、基督穷人派、里昂穷人派等(Audisio 1999:3)。瓦勒度派这个不甚恭敬的称号,源于其公认的教派创始人——瓦勒度(Vaudès, Valdès):此公生于里昂的富裕商人家庭,1170年前后皈依基督教并捐出了自己的所有财产,从此在里昂市的穷人中传播福音。多明我会(Dominican)修士波旁的斯蒂芬(Stephen of Bourbon)以一种轻蔑的口吻描绘了瓦勒度的活动:

他在大街小巷宣扬福音,也宣扬他的个人感悟,吸引了一批与他大同小异的男男女女,并让这些人从福音书中汲取力量。他还让那些从事最下贱职业的人到临近村庄布道,其中有男有女、大字不识、蒙昧无知,他们在村庄里转悠:或是挨家挨户上门布道,或是在空地上甚至教堂里布道,劝诱人们像他们那样行事。(Kaelber 1998:135)

与同一时期朗格多克(Languedoc)和比利牛斯(Pyrenees)的清洁教派(Cathar Perfects)——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对之有过生动的描绘——以及15世纪早期捷克的胡斯教派(Czech Hussites)一样,“里昂穷人派”致力于恢复早期基督教的质朴本质。(瓦勒度派自称自基督立教以来一直延续至今,这种说法掩盖了它起源于12世纪的事实。)1182年,里昂市的当权教会将瓦勒度派逐出该市;1184年,教皇卢修斯三世(Lucius III)又将他们逐出天主教会。就整个13世纪而言,尽管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统治者只是针对瓦勒度派颁布了一些惩戒性的政令,但

*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1929—):法国历史学家,当代“来自底层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和“微观史学”(microhistory)的领军人物,其著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已由商务印书馆于1997年10月汉译出版。——译者注

瓦勒度派自此——被逐出里昂市之后——便开始转入地下。里昂派从里昂消失了，他们退隐到了阿尔卑斯山谷，出于日常隐蔽之需，仅通过被称为“巴比”(barbes)的传教士与多菲内省和皮德蒙特交界处的信众保持联系。这个时候，瓦勒度派的牧师已清一色地由男性组成。

瓦勒度派从欧洲腹地延伸至欧洲其他地区。他们不时派人远赴波河平原、阿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勃艮第、普罗旺斯、奥地利、波希米亚和莱茵兰*定居，而这些离散社群又进一步分离出诸如“伦巴第穷人派”(Poor Lombards)等新的宗教派别，还衍生出了独树一帜的波希米亚禁欲主义(Kaelber 1998:147—151)。瓦勒度派的延伸范围如此之广，甚至胡斯教派的部分著作也被译成了普罗旺斯语(MacCullonch 2003:38)。在经历了四个世纪的地下生存状态之后，瓦勒度派又再次主要集中到了上阿尔卑斯地区。

宗教改革发端不久，一位名为乔治斯·莫雷尔(Georges Morel)的“巴比”给巴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新教领袖写了一封信，信中介绍了自己的牧师群体及其所秉持的穷人德性：

我们的人几乎全都来自畜牧业和农业，年龄在25—30岁之间，都没有受过教育。我们让他们在群体中接受3—4年的考验，其中包括2—3个冬季……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教他们写字和阅读，教他们用心灵领悟《马太福音》、《约翰福音》、《使徒行传》的部分章节以及《保罗书》的重要篇章……经受住考验的人会被安排到一个特定的地点，在那里居住着一些保持着处子之身的妇女，

* 波河平原(Po Valley)：意大利北部冲积平原，西起阿尔卑斯山脉、东至亚得里亚海，绵延600公里，米兰、都灵、威尼斯等城市均坐落于此。阿普利亚(Apulia)：现为意大利南部大区，东邻亚得里亚海，南临奥特朗托海峡和塔兰托湾。卡拉布里亚(Calabria)：现为意大利南部大区，北邻巴斯利卡塔大区、西南临近西西里自治区、西起第勒尼安海、东至爱奥尼亚海。勃艮第(Burgundy)：现为法国中部大区，下辖科多尔省、涅夫勒省、索恩—卢瓦尔省和约讷省。普罗旺斯(Provence)：位于法国东南部，现属于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毗邻地中海、与意大利接壤。波希米亚(Bohemia)：中欧古地名，现位于捷克共和国中西部地区。莱茵兰(Rhineland)：德国西部莱茵河两岸地区，原为普鲁士莱茵省，现含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两个州。——译者注

她们是我们的姐妹。他们在那里呆上 1—2 年,大部分时间用于田间劳作。规训期满后,信徒们接受圣餐和圣礼的洗礼,然后被批准成为传教和布道的牧师。他们被两人一组地外派传播福音,其中一号被授予荣耀、尊贵和权威,成为二号同伴的师傅……我们决不结婚,因为即便是为真理作见证,也很难保证一生处处洁净。我们的衣与食都来自信众的施舍。(Paravy 1993:II, 1034)

由于处于官方迫害之下,无论传教士还是信众都长期面临被人告发的威胁——只需一个变节分子就可令其生命和财产化为乌有;因此,为了应对这种风险,瓦勒度派建构起了强大的信任网络——信任网络愈是强大,信仰愈是持久。与此同时,被瓦勒度派信任和不被瓦勒度派信任的人,其间的分野也愈加尖锐了。

在经历了早年的里昂遭遇之后,“巴比”们为了免遭迫害理所当然地不再公开布道,而是戒备地、秘密地、挨家挨户和个别访谈式地劝人改宗。年轻的二号传教士皮埃尔·格里奥(Pierre Griot)承担了大量工作。1532 年,他不幸落入宗教裁判所之手,并被提交给了普罗旺斯多明我会裁判官罗马的吉恩(Jean of Roma)。以下是当时的一段审讯记录:

问他,他们为什么不敢公开传播教义。

——他说,他相信是因为恐惧。

问他,他们的教义是善是恶。

——他说,他们相信是善的。

问他,既然他们认为是善的,为什么不在公开场合布道。

——他说,是因为恐惧。(Audisio 1999:88)

随着 16 世纪新教教义在民众中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大多数瓦勒度派教徒都融入了新兴的宗教改革运动并转化为其中的某个分支,从

而使其两个世纪的秘密活动和独特经历化为历史。例如，加尔文的日内瓦*曾在16世纪派出传教士，渐次将阿尔卑斯附近的许多瓦勒度派信众转入新教教会。

从17世纪中叶起，萨伏依公爵**对其辖区内的瓦勒度派教徒进行了驱逐和屠杀，以此显示其反对新教的决心。一部分瓦勒度派教徒为逃避萨伏依的迫害，流亡到了相对宽容的荷兰殖民地斯塔腾岛***——纽约(MacCulloch 2003:672)。尽管迫害依然不断，但是，一个得以正式组织化(并被正式命名为瓦勒度派)的瓦勒度教会开始成为皮埃蒙特的新教中心。该教会一直延续至今，人数不多却活力非凡，信众遍布整个西方世界。不过，作为一种独特的、秘密的、编制严谨的信任网络的“里昂穷人派”，却在16世纪和17世纪渐渐瓦解了。

凝聚瓦勒度派的不只是人际网络，而且，还应当称其为信任网络：因为其成员关系是将重大而长期的集体性事业(collective enterprises)置于其他成员的失信(malefaisance)、失误(mistakes)或失败(failures)的风险之中。就瓦勒度派而言，该网络承担着生命、财产和信仰上的成败风险，仅仅一个奸细、叛徒或宗教裁判所刑具下的软骨头，都有可能让瓦勒度派的网络遭到灭顶之灾。至于那些由血缘关系、长途贸易或工匠之间的互帮互助所形成的信任网络，尽管不太可能面临——对瓦勒度的信徒们已是家常便饭的——死亡和放逐的威胁，但是，由于网络所涉及的事务及其运作状况事关重大，因此，信任网络迥然不同于一般的交往和贸易网络。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所面对或身处的就是一个信任网络呢? 首

* 1541年，流亡在外的新教改革领袖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年)应邀重返日内瓦领导宗教改革和市政工作，日内瓦自此被改造成实行政教合一体制的“新教的罗马”，加尔文亦被后世讥讽为“日内瓦的教皇”。——译者注

** 萨伏依公爵(Dukes of Savoy): 萨伏依王室的统治者，17世纪中叶卡洛·埃曼努埃莱二世(1638—1675年)和维托里奥·阿梅迪奥二世(1675—1720年)相继执政。萨伏依王室是欧洲著名宗室，1416年被封为神圣罗马帝国公爵，1861—1946年间一度统治意大利。——译者注

*** 斯塔腾岛(Staten Island): 现为纽约市下属5个次级行政区中地域最遥远、人口最稀疏、开发程度最低的地区。——译者注

先，信任网络意味着由共同的纽带——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群，他们组成了一个网络。其次，信任网络意味着由于存在这样的纽带，因而网络成员的重大诉求得到了关注、网络成员之间彼此扶助，而网络也正是由若干诸如此类的强大纽带构成的。再次，信任网络意味着网络成员共同承担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事业，如生育、长途贸易、工匠互助、地下宗教活动等。最后，信任网络意味着网络纽带之构成(configuration)，源于将共同的事业置于其个体成员的失信、失误和失败的风险之中。

瓦勒度派教徒维系着一个庞大的信任网络，其网络成员常常为了其他成员而甘遭迫害和放逐。它独特而动荡的历史生动地演绎了政权发展史中的一个基本问题(general problem)：政权的公共政治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众的基本信任网络(basic trust networks)与统治者的统治策略(strategies of rule)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就此意义而言，公共政治包含了所有显而易见地存在于所涉之政治角色和政府代理人之间的交互行为。无须纠缠于术语，这里所说的“统治者”(rulers)是指人格化的国家权威；“政府代理人”(governmental agents)是指替统治者说话或办事的人；“政府”(governments)是指政府代理人所运作的组织；“政治角色”(political actors)是指享有某类名号并与既定政府相对应的非政府实体；“政权”(regime)是指统治者、政府和政治角色之间的常态关系；“公共政治”(public politics)是指统治者、政府和政治角色之间的外在交互行为。

公共政治中的斗争政治*，涵盖了所涉之政治角色——包括政府代理人 and 统治者——的一切非连续和群体性的诉求伸张活动(McAdam, Tarrow, and Tilly 2001)。无论信任网络、信任网络的各个部分还是信任

* 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亦有译为“抗争政治”。“抗争”的中文词义含有自下而上、依法或据理力争之意，而斗争政治或社会运动并非天然正义(如反犹或反天主教的社会运动)，亦不乏政府或其他权威自上而下组织的社会运动(如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和意大利)，故仍译为“斗争政治”。——译者注